

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

臧振華*

中文摘要

南島語 (Austronesian languages) 是世界上最大的語系之一，目前說這一語言的人口大約有 4 億，包含了 1200 多個語言；在地理分佈上，北到臺灣，南到紐西蘭，東到南美洲秘魯西邊之復活節島，西到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約三分之一以上的廣大水域。這些說南島語的民族，在語言上呈現系統性之演化關係、在文化上有許多共同之特質，顯示可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其分離擴散的時間，也不致太久遠。然而關於南島語族究竟是從哪裡起源？又如何擴散？始終是東南亞和太平洋人類歷史上亟待解答的重要問題。近年來有不少語言學者、考古學者、人類學者，以及人類遺傳學者，試圖進行探討，並產生多種理論的爭辯。而在這些爭辯中，臺灣所能提供的語言、考古和原住民遺傳基因的資料，始終受到極大的關注。這不僅是由於臺灣介於中國大陸和太平洋之間的陸橋位置，而且也因為臺灣所具有南島語言的複雜性，以及史前文化與現住南島族群之間的可能連結。本文試圖以在臺灣及其周邊地區所發現的一些新的考古資料，來重新檢討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本文的結論認為：南島語族的祖先可能居住在福建南部到越南北部之間的南中國海北岸地帶，他們可能是在複雜的動機或因素下，以多條路徑，而非僅有一條，越過南中國海，擴散到菲律賓及其他東南亞的海島。

關鍵詞：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快車假說、出臺灣假說、出東南亞假說

一、前言

南島語 (Austronesian languages) 是世界上最大的語系之一，目前說南島語的人口，約有 4 億，包含了 1200 多個語言，在地理分佈上，北到臺灣，南到紐西蘭，東到秘魯西邊之復活節島，西到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約三分之一以上的廣大水域。這些共同說南島語的民族，在語言上呈現系統性之演化關係、在人種上大都同屬於「海洋蒙古種」、在文化上亦有許多相近之特質，顯示可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而其擴散分離的時代，也不致久遠。然而關於南島語族究竟是從哪裡起源？又如何擴散？始終是東南亞和太平洋人類歷史上亟待解答的重要問題，近年來有不少的語言學者、考古學者、人類學者，以及人類遺傳學者，試圖進行探討，並產生不同理論的爭辯。而在這些爭辯中，臺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能提供的語言、考古和原住民遺傳基因的資料，始終受到極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員

大的關注。這不僅是因為臺灣介於亞洲大陸和太平洋之間的陸橋位置，而且也在於臺灣位居南島語族地理分布的最北邊，具有相當複雜的南島語言，同時臺灣又有相當長久的史前文化，並與現住南島族群之間可能有所連結。過去筆者曾經寫過幾篇文章談論這一問題⁽¹⁾，本文想要依據近幾年臺灣與周邊地區的考古新發現，對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再作一些思考和討論。

二、有關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的假說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就有語言學者、考古學者和人類學者關注南島語族的來源問題。1899年荷蘭語言學者柯恩(H. A. Kern)利用語言古生物學的方法推測「古南島語族不僅住的地方靠海，而且是個航海民族」，他們「大概居住在 Champa、中國與越南交界處、高棉、以及沿海的臨近地區」(引自李壬癸 1979: 3-4)。奧地利史前學者 Heine-Geldern (1932) 首先認為南島語族可以方角石斧(Vierkantbeil)為代表，推測其起源於亞洲大陸，經過中南半島，傳到東南亞的海島。長期在菲律賓工作的美國考古學者 H. Otley Beyer (1948) 也持與 Heine-Geldern 類似的看法。挪威民族誌學者 Thor Heyerdahl (1951) 主張居住在復活節島、夏威夷、紐西蘭和薩摩亞之間的波里尼西亞人，是在紀元 500 年之時來自於南美洲之秘魯，他並於 1947 年以一隻以 Kon-Tiki 為名之木筏，費時 101 天，從秘魯西海岸航行 4300 哩(7000 公里)到達復活節島，來證明他的波里尼西亞人源於南美洲理論。

到了 1950 年代，我國民族學者凌純聲和考古學者張光直也分別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凌純聲(1950、1955)依據中國古代文獻史料和太平洋的民族誌資料，認為南島民族中的印度尼西亞文化是源於古代華南的越獠文化。張光直(1959)則依據考古學的資料，推論大陸華南百越及百越以前的居民向南方移居者成為日後南島民族之祖。此外，日本學者鹿野忠雄(1955)從臺灣的考古學和民族學資料推測南島語族應源於華南和中南半島東岸。美國人類學者 Ralph Linton (1955) 從比較民族學的眼光，擬測了一個史前的東南亞文化叢(Southeast Asiatic complex)，與上述 Heine-Geldern 的方角石斧文化相當。

1975 年，Richard Shutler Jr. 和 Jeffrey C. Marck (1975) 首先嘗試為南島語族的擴散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架構。他們認為，就當時的考古和語言分類的資料來看，南島語族的擴散應該是與園藝農作相關連；而年代在 9000 B.C. 到 2500 B.C. 之間的臺灣繩紋陶文化，則可能代表最早的南島語群體。所以 Shutler 與 Marck 認為臺灣應該是南島語族最早的原居地。至遲在 4500 B.C.，臺灣的南島語族已經從菲律賓遷移到 Celebes、Moluccas，以至 New Guinea。稍後又到達印尼的西部。到了 4000 B.C. 前後，印尼東南部的南島語族又繼續向大洋洲擴散。這無疑是第一個將臺灣當作南島語族起源地，並將之與波里尼西亞具體拉上關係的推論。

⁽¹⁾ 例如 “Recent discoveries at the Tapenkeng culture sit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blem of Austronesian origins” 收入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2005)。“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aiwan and Northern Luzon: implications for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收入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2007)。〈呂宋島考古與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問題〉，《東南亞的變貌》(2000)。

此後，有更多的語言學者、考古學者與人類學者對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進行探討，但是非但沒有釐清問題，反而產生了更多的爭論；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分子生物學者也加入了戰局。迄今，有關的爭論，大致可區分為三派。

第一派被稱之為「快車假說 (Express-train Hypothesis)」。這一假說是緣於對人類拓殖波里尼西亞的探討。語言學的證據顯示：波里尼西亞人的語言都是屬於南島語，而且互相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與其東邊包括新幾內亞在內的美拉尼西亞地區之語言則有明顯的差別。這個語言學的證據說明，波里尼西亞人的祖先可能沒有與美拉尼西亞人產生有意義的混和，即快速地從東亞地區移居到了波里尼西亞。Diamond (1988) 以「快車 (Express-train)」來形容這一假說。

以後，Robert Blust 與 Peter Bellwood 等學者又提出了「出臺灣假說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Blust (1988) 從南島語族分群和詞彙所反映自然環境的比較證據，擬測了南島語的發展過程，對南島語族的擴散有重要的意涵。他認為在 4500B.C. 的時候，原南島語 (Proto-Austronesian) 分化為福爾摩沙語 (Formosan) 和馬(來)波(里尼西亞)語 (Malayo-Polynesian) 語，而這個分化的地方即是在臺灣或附近，所以臺灣應該是南島語的起源地，至少非常接近這個起源地；到了 3500 B.C.，南島語可能從臺灣進入菲律賓，以後從 3000 B.C. 開始，再逐漸從菲律賓向婆羅州、印尼和太平洋諸島嶼擴散。Bellwood (1980, 1983, 1988) 也認為南島語族的祖先是居住在大陸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的農民，由於穀類農業的發展，造成人口的成長，因而需要新的土地從事農業，於是從 6000 年前以後，開始向海外擴散。大約在 5500 年前的時候，到達臺灣，5000 年前繼續擴散到菲律賓北部，而到了 4000-2000 年前之間，南島語族已經佔居了整個島嶼東南亞，並逐漸取代了原有的狩獵和採集族群。張光直 (1989, 1989) 也是大陸/臺灣起源說的倡導者，他認為原南島語自大陸東南的原居地 (包含臺灣) 向外擴張，應該不會晚過大坌坑文化，並且認為原南島語之所以從大陸東南閩粵沿海遷移到臺灣，主要是受到來自大陸北方以龍山形成期文化為代表的漢藏語族壓迫所致。

近來，一些分子生物學者根據母系遺傳的粒腺體 DNA 的標記分析資料，也認為波里尼西亞人是源於亞洲大陸的華中和華南。(Melton and Peterson 1995, Trejaut 2005, Kayser 2000)

第二派是所謂的「出東南亞假說 (Out of Southeast Asia Hypothesis)」，認為南島語族的源頭是在島嶼東南亞。持這一假說的學者以語言學家 Isidore Dyen，以及考古學者 Wilhelm G. Solheim 和 William Meacham 為代表。

在上一世紀中期，Dyen (1965) 即利用南島語的詞彙統計分類，首先提出了一個南島語起源與擴散的理論。他認為南島語最早的擴散中心是印尼東部以及美拉尼西亞的 New Guinea 和 Bismarck Archipelago 一帶。Solheim (1975, 1996, 2006) 則依據考古資料，提出了一個「Nusantao 假說」。「Nusantao」在南島語中是海島居民 (Island people) 的意思，Solheim 以這個名詞取代「Austronesian」，是因為「Austronesian」僅是語言的意涵，並非指族群。Solheim 認為說南島語的族群，原來是分佈在菲律賓南部和印尼北部的一些以

海洋資源為生的海島居民，即「Nusantao」。後來，他進一步將「Nusantao 假說」擴大成「島民海洋貿易與交通網絡 (Nusantao Maritime Trade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簡稱 NMTCN) 假說。此一假說提出:南島語基本上是一個貿易語言，最早是更新世時居住在菲律賓南部 Mindanao 和印尼東北 Bismark 群島一帶的居民。他們說的語言是「先南島語」(Pre-Austronesian)。這些居民，因為更新世結束後的海水面上升，使許多陸地變成了島嶼，而被迫增強了航海的能力，以維持與親族或家鄉的聯繫。大約在 5000 B.C.，這些說先南島語 (Pre-Austronesian) 的航海民族開始向菲律賓的 Mindanao、Visayan 和呂宋島南部拓展。在 4500 B.C.，到達呂宋島北部、臺灣和華南沿海，並發展出原南島語 (Proto-Austronesian)。他們航向四面八方，除了沿著華南海岸向南經越南沿海擴散到砂朥越、婆羅洲和印尼東部海島一帶，向北則可能擴散到韓國和日本，並繼續與臺灣和菲律賓北部接觸。此時，南島語成為一種貿易語言。在大約 4000 年前，發展出 Malayo-Polynesian 語，並向東朝太平洋擴散。所以 Solheim 認為南島語族其實是源自島嶼東南亞的土著，其最早的源頭是在 Bismark 群島和菲律賓南部之間。

William Meacham (1988, 1995) 也持類似的看法，他認為臺灣的南島語言和文化應該是在本土演化形成的，而其最早的住民也不是來自亞洲大陸，而是熱帶海島人口的一部份。這些人群大約是在 10000 到 5000 B.C.之間從南方的菲律賓來到臺灣，以後就變成一種孤立的狀態而在島內自行演化，惟其間曾受到大陸東南沿海和南方菲律賓的影響。所以，Meacham 認為南島語族應是源於臺灣、Sumatra 和 Timor 之間所形成的三角地帶。

第三派是被稱作「慢船假說 (Slow Boat Hypothesis)」。這一派的看法，有異於第一派的「快車假說」，是由一些遺傳學家依 Y 染色體標記所提出的。他們認為波里尼西亞人的祖先是源於亞洲，但是在他們進入大洋洲之前，已經與美拉尼西亞人有了很廣泛的混血 (Kayser 2000)。此後，以 Stephen J. Oppenheimer (2001) 為首的若干遺傳學者根據更多的 DNA 分析結果指出，由波里尼西亞人所特有的基因標記 (Polynesian markers) 顯示，他們祖先的源頭是在熱帶島嶼東南亞一帶，介於華萊士線 (Wallace Line) 與新幾內亞之間，而不是中國和臺灣。

除了上述三派假說，還有所謂的「糾纏地帶假說 (Entangled Bank Hypothesis)」和「三 I 假說 (Tripple I Hypothesis)」。前者是 John Terrell (1988, 2004) 所提出。在達爾文 (Charles R. Darwin) 「物種原始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中有「entangled Bank」一詞，意指自然界的複雜性，Terrell 以此詞為隱喻，指出南島語族在太平洋的移民史不是簡單的擴散，其實是一個複雜糾纏的過程。以新幾內亞北岸的情形來看，人類從晚更新世就已經居住在這裡，他們不僅是對當地的自然環境有良好的適應，而且在過去數千年中，透過複雜的社會與貿易網絡，與東南亞有所連結。所以，Lapita 文化與人群的形成，是緣於複雜的過程，而不是像坐著「快車」般，一路從臺灣經過東南亞海島到達遙遠的大洋洲。至於「三 I 假說」，是 Roger Green (1991) 所提出，同樣強調南島語族擴散問題的複雜性。他認為代表南島語族的 Lapita 文化之所以出現在大洋洲，並非直接由東南亞移入，而是緣於多重因素的結果，包括來自非土著亞洲元素的進入 (Intrusions)、當地新的發明 (Innovations)，及非土著與土著元素的整合 (Integration)。

歸納上述各種南島語族起源的假說，就指涉的起源地來看，可以概分為大陸/臺灣起源和東南亞海島起源兩派。前者主張南島語族是源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臺灣一帶，經由臺灣向東南亞和大洋洲擴散。後者，則認為南島語族是起源於東南亞的海島，藉著更新世結束以後所發展出來的航海技術，向菲律賓、臺灣、大洋洲、甚而大陸東南海岸擴散。雖然他們所用的證據都不出語言學對南島語的分群（subgrouping）、考古學的器物特徵及其年代排比與空間分佈，以及地理和環境變遷因素的考量。近來，又加上了人類 DNA 的分析資料。但是，顯而易見的，這些證據不但無助於問題的釐清，反而造成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

語言分群的證據，是語言學家依據現存語言的同源詞的比較和統計擬構出的樹枝圖，來顯示各個語言間之親疏關係。但是要將此樹枝狀的語言分類回溯到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的史前時代，並將各個「樹枝」安插到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考古文化架構當中，其困難度無疑是很高的。姑且不論語言樹枝圖本身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考古資料所能呈現的證據，尤其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沒有了考古證據，語言的樹枝圖，可能永遠只能停留在擬構的層次，而無法與古代人群和文化連接。至於地理和環境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對於人類的行為和活動，自然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並不具有絕對地必然性。所以，有關這方面的考量，還是有賴考古證據的支持。而人類 DNA 的分析，是上一世紀末才加入這個問題的探討，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利器，但是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來，由於受到樣本易於遭受污染及古 DNA 淬取之困難，加上取樣本身所可能存在的誤差，其分析之結果，顯然還不是很可靠（Kingsley 2003）；因之，問題的最後，就必須歸結到具體的考古資料和證據上。所以，欲釐清南島語族的起源問題，考古學的研究顯然扮演一個極為關鍵性的角色；而語言學和遺傳學的解釋必須得到考古證據的支持。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在南島起源問題的研究上，考古學所能提供的證據，其實還是相當薄弱，這主要是因為目前所有的考古資料，還不足以讓考古學者對各地區考古文中的複雜因素，進行有系統的梳理。所以，研究的關照僅能侷限於個別器物特徵的排比。其結果是：對於同一類器物特徵，可以產生完全相反的解釋。例如，Bellwood 將帶有紅色陶衣之陶器（red-slipped pottery）作為驗證南島語族文化由臺灣向菲律賓及印尼群島擴散的重要標誌。所以，他認為臺灣三、四千年前的若干遺址所出土的陶器，由於具有一些類似菲律賓北部之裝飾特徵，如刻劃紋，點印紋，特別是紅色陶衣，可以作為臺灣新石器時代稻作農業民族向菲律賓擴散的具體證據。而 Solheim 則以為帶紅色陶衣的陶器其實是代表東南亞最早的陶器「前沙黃—卡拉奈陶器（The Pre-Sa Huyunh-Kalanay Pottery）」的裝飾成分之一，而這種陶器風格不是源自臺灣，而是發生於中南半島沿海。這一陶器風格，透過海上貿易和交通網絡，在菲律賓南部和印尼東部和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發展成了代表南島語族的「沙黃—卡拉奈陶器傳統（Sa Huyunh-Kalanay Pottery Tradition）」和「拉皮達陶器傳統（Lapita Pottery Tradition）」，成為現代南島語族的祖先。

因之，Katherine Szabo and Sue O'Connor（2004）即對這樣的研究提出了批評，並提出了三個質疑：1.所謂器物特徵的相似性，其實是非常模糊不清的，2.作為人群移動指標的器物配套在各地區考古文化間還缺乏文化脈絡上的一致性，3.考古遺物與語言之間連結，缺乏嚴謹的比較分析和驗證。

因此，目前有關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之探討，有必要在考古資料的內容和比較分析上多所改進與充實。

三、臺灣及其周邊地區在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上的重要性

臺灣在南島語族起源問題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目前擁有大約 40 多萬說南島語的住民，同時也在於這些南島住民與臺灣史前文化的可能連結。而臺灣史前文化與其周邊地區的類緣關係，又可能涉及古代南島語族遷徙的方向和路徑。所以，臺灣與其周邊地區的史前文化和彼此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為探討南島語族起源問題的學者所重視。而在臺灣的周邊地區中，就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北邊日本和琉球的史前文化與臺灣的關係並不明顯（陳有貝 2002），可以暫時略而不論。而西邊的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和南邊的菲律賓，長久以來，即被認為與臺灣有密切的史前文化關係，而且也涉南島語族的遷徙，討論者甚眾。

關於臺灣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文化關係的討論。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學者是鳥居龍藏，他早在 1897 年即認為臺灣的若干石器類型和中國南部、安南、菲律賓方面可能有密切的關係。以後，金關丈夫也在〈臺灣先史時代的北方文化影響〉(1943)一文，推論臺灣史前遺址出土之「有肩石斧」、「靴形石器」、「石刀」、「有孔磨製石鏃」和「有柄石鏃」，以及「黑陶」、「彩陶」和「紅陶」等都是來自大陸北方之因素。國分直一則以〈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黑陶文化〉一文（1943）申論史前時代臺灣和周圍各地區的交流關係。另外，鹿野忠雄〈臺灣先史時代的文化層〉（1943）一文，根據器物的形制學及其地理分佈上的研究，提出臺灣史前文化是由繩紋陶、網紋陶、黑陶、有段石斧、原東山、巨石和菲律賓鐵器等七個化層所構成的假說。鹿野氏以為臺灣史前文化的基底是中國大陸的文化，上述的繩紋陶、網紋陶、黑陶、有段石斧等文化層即代表此種文化層數度波及臺灣。

然而首先將臺灣史前文化的外部關係與南島語族來源問題聯繫起來的是 Raleigh Ferrell。他根據語言學者 Isidore Dyen 對臺灣南島語所作的分類，加上他自己所蒐集臺灣土著族民族誌和語言學的資料，將臺灣的土著族分為三個主要的語群，即泰雅群、鄒群、和排灣群。他將這三個語群與當時所知的臺灣三個主要考古文化作了連結：

考古資料很清楚地顯示，大多數的臺灣土著族群和文化特質都是源自華南。仔細檢視這些將現在臺灣土著分三個語群的文化與語言資料，清楚地提供了可以將這三個語群與臺灣三個主要史前文化個別連繫的線索。如此就可以讓我們為現今各臺灣土著在華南找到一個可能的來源地。泰雅語群和繩紋陶文化層顯示出與華南和大陸西南區的清楚的親緣關係；鄒語群和臺灣北部原龍山形成期（圓山）文化具有顯著不誤的北方要素，也許可以代表早先居住在華東沿海，甚或北到日本、韓國一帶的較北邊的大陸南島民族。排灣語群和臺灣南部的龍山形成期—幾何印紋陶文化層，也許是中介於泰雅語群之間的大陸某地，他們的文化基本是漢人之前的大陸文化。他們來到臺灣主要是在

公元前的第一和第二個千年的時候，龍山形成期文化的農民自大陸西北的核心地區向東南亞大陸和太平洋島嶼大規模移動的一部分。（Ferrell 1966：97-130）

約在此同時，張光直（1969）依據鳳鼻頭和大坵坑兩個遺址的發掘資料，對臺灣民族學和考古學的關係也作了討論。他發現考古資料所顯現的情形，與語言學者所擬測的古臺灣南島語的分離情形，非常符合。即：在遠古的時候（大約是 2500 B. C.）臺灣的兩個最主要的語群，泰雅和排灣，開始分離，而在這同時，排灣語群本身也開始分裂。在考古方面，大約在 2500 B. C. 臺灣出現了兩個主要的文化，其一是北部的圓山文化，另一個是南部的「龍山形成期文化」；而後者可分為三個文化的分期，每一個分期都可回溯到中國大陸上的一個文化群。基於這一情形，張先生推測，排灣族群，很可能和考古資料上的「龍山形成期文化」關聯；而泰雅語群，由於其在地理分布上和圓山文化的相近，再由於其文化的特質和圓山文化同樣地表現出和大陸西南地區的親緣關係，所以兩者之間也極有可能連結。最後，張氏認為現在臺灣的南島語族，很可能是源於「龍山形成期」和圓山這兩個史前文化。

1969 年 Ferrell 檢討了他先前所提臺灣的三個土著族群相等於三個考古文化層的假說：

「語言學的證據並不支持以往認為臺灣土著是分批遷移來臺的學說」。「即使所有臺灣土著的祖先都是一次到達，並且都說一樣的語言，回到四、五千年前這一段漫長的時間，已足夠使這語言成為今天所見分歧的樣子。」（頁 73）

不過，為了兼顧當時語言和考古這兩方面的證據，Ferrell 還是嘗試提出了四個臺灣南島語言來源的可能：

- (1) 所有臺灣土著語言是從在臺灣的同一個祖語發展而來，
- (2) 可能是兩個獨立的遷移，即泰雅群、鄒群，
- (3) 可能是三個遷移，即泰雅群，鄒群，排灣群，
- (4) 可能是四個遷移，即泰雅群，鄒群，排灣第一群，排灣二群。

由以上這些討論可以看出，如欲更清楚地解釋臺灣南島語族的來源和演變，除了語言學者要對臺灣土著語言的分群作更正確地分析之外，考古學者所也需要釐清臺灣各個史前文化間彼此的發展關係，並要找到它們的來源，尤其是臺灣新石器時代文化最早的源頭。

目前臺灣所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年代在五、六千年前左右的大坵坑文化。雖然這個文化，與屬於舊石器時代的長濱文化，在年代可能略有重疊，但是從文化的內容上來看，他們之間卻找不出可以連結的地方。現在，考古學家們大都認為，大坵坑文化應該不是長濱文化發展起來的，而可能是一個自外地移來的新文化。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大坵坑文化的來源，不僅是關係到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與臺灣周邊地區的類緣關係問題，更涉及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這一備受國際學術界關注的大問

題。如前文所述，早在 1966 年，Ferrell 已經將大坌坑文化與南島語族聯繫起來，後來的學者如 Shutler 和 Marck (1975)、Bellwood (1979)、Blust (1988) 和張光直等也都結合考古學與語言學的資料，推測大坌坑文化可能代表最早的原南島語族 (proto-Austronesians) 人群，他們可能從大陸東南沿海移民到臺灣，並從臺灣擴散到東南亞和太平洋。

但是這種觀點並非全無異議。Meacham (1988) 就認為，從風格上看，臺灣的大坌坑文化與大陸華南同時限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有明顯的不同，所以，在大坌坑文化的時期，臺灣與大陸之間並沒有人群跨越臺灣海峽移動或作任何有意義的接觸。此外，也有其它學者不認同大坌坑文化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文化的關係。例如，日本學者加藤晉平 (2003) 比較大坌坑文化陶器與福建、廣東一帶遺址出土的貝印紋陶器，認為臺灣的大坌坑文化與大陸東南沿海之間並不存在具體的關係。顯然，關於大坌坑文化的來源，以及其在南島語族起源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迄今仍然有所爭辯。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筆者以為，主要是以往所出土大坌坑文化的資料相當貧乏之故⁽²⁾。

其次，看一看有關臺灣與菲律賓史前文化關係的討論。菲律賓的地理位置，北與臺灣相鄰，南與馬來、印尼和太平洋諸群島相接，它與臺灣之間史前文化的關係，也成為探討南島語族起源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最早提到臺灣與菲律賓史前文化關係的是 Heine-Geldern。他在 1932 年所提出的「文化波 (waves of culture)」理論中，以東亞和東南亞的區所常發現的石器—石斧 (石鏞)⁽³⁾ 的三種類型，來說明東南亞地區史前文化的三個階段的傳播和移民。其中圓角石斧 (Walzenbeil) 的分布代表原新石器時代文化從華北、日本，通過臺灣到達菲律賓，最後傳播到印尼東部和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亞。其次，有肩石斧 (Shouterbeil)，代表東南亞大陸的南亞語系 Mon-Khmer 語文化，從印度東北部向東南亞大陸移民。第三種，方角石斧 (Viekantbeil)，在東亞和東南亞有廣泛的分佈，代表早期的南島民族。他認為這一文化是從華北，傳佈到中南半島和馬來亞南部，然後移動到印尼，再分為兩路，一路從印尼南部到 New Guinea，一路從婆羅洲，菲律賓，臺灣，最後到達日本。

H. Otley Beyer 受到 Heine-Geldern 的影響，推論南島語族曾有數次從華南和越南移動到菲律賓，而在呂宋島所發展出的有肩和有段石鏞，又被移民向西帶入波里尼西亞。Beyer 也依據麥兆漢神甫 (Fr. R. Maglioni) 1938 年所發表海豐考古的研究成果，以及 1940 年所發表在華南的考古發現，討論珠江三角洲與菲律賓之間在史前文化上的關連性。(Maglioni 1975) 他認為從石鏞來看，海豐—香港地區與菲律賓的呂宋島間曾有直接的接觸；而且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由圓角石鏞到方角石鏞之過渡時期，曾不止一次的接觸，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之末，方角石鏞到達臺灣和呂宋 (Beyer 1948)。另外，鹿野忠雄也曾在〈臺灣先史時代的文化層〉一文中，認為臺灣史前文化層序中年代最晚近的鐵器文化層是從菲律賓傳入。

⁽²⁾ 雖然在大坌坑和鳳鼻頭發掘之後，臺灣各地，包括北部海岸、臺北盆地、西南海岸、東部海岸、和澎湖群島先後又發現了出現大坌坑文化遺物的遺址，總數約有二十餘處；其中，在北部地區有下厝大埔、圓山、芝山岩、關渡、庄厝、水碓尾、四棧橋、鄧公國小等。在中部地區有牛罵頭、牛埔和惠來里等。在南部地區有八甲村、福得爺廟、孔宅和六合等。在東部地區的若干遺址也出土大坌坑文化的陶片，如卑南下層、長光、大坑、鹽寮、花崗山、嶺頂、橄子樹腳、港口和月眉 II 等。在澎湖群島，有菓葉 A 遺址、北寮、山嶺腳和蒔板頭山下層。但是由於具體發掘的遺址很少，所能提供的相關資料還相當貧乏。

⁽³⁾ 「鏞」，在學界中名詞之使用並不統一。西方學者多將中國或日本學者所說的「斧」，稱為「鏞(adz)」。

以後，Robert Blus 和 Peter Bellwood 對臺灣與菲律賓史前文化的關係作了更具體的陳述。

Blust (1988) 依據語言學所擬測原南島語最早分化為臺灣的幾個南島語和馬來波里尼西亞語，推測臺灣的南島民族曾經直接航行到菲律賓的呂宋島。他說：

從馬來波里尼西亞語的分佈來看，這一個分化的歷史含意是：馬波語曾是分佈在印尼中部，可能是 Sulawesi。但是從臺灣或華南移到印尼中部的過程中，不太可能遺漏了菲律賓。臺灣作為南島語族的最早的落腳地，則第二個落腳地肯定是菲律賓。如果臺灣是南島民族最早的老家，則可以從那裡直接航過巴士海峽和呂宋水道，其間可能經過蘭嶼、巴丹島和巴布延島而到達菲律賓。如果南島語族的最早的落腳地是在華南閩粵沿海一帶，則可以從那裡直接航行到菲律賓。不過，我認為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頁 55)

Bellwood (1983) 將語言學現象與考古資料結合起來，認為：

假如我們接受語言學有關南島語持續變遷的觀點，則我們可以將南島語族的擴散與東南亞海島陶器使用的考古記錄等同起來。此一考古記錄顯示了相當一致的同源性和年代上從北向南遞減的規律性（我認為東南亞叢林中非說南島語的狩獵和採集民族獨立發明製陶的可能性極低）。所以，5,500 年前的時候，華南的稻米種作文化向臺灣擴散，5,000 年前，繼續前進菲律賓，4,000 年前在印尼落腳，3,000 年前西到馬來亞的盡頭，東到 Samoa Islands，1,500 年前，擴及 Easter Island 和 Madagascar。(頁 80)

Bellwood 所說的陶器，主要是指一種素面帶紅色陶衣為特徵的陶器。他認為這種陶器不但見於若干臺灣的史前遺址，也見於菲律賓，並且成為太平洋群島中拉皮達文化 (Lapita Culture) 的特徵。這也成為 Bellwood (1987) 推論南島語族繼續由臺灣、菲律賓、向島嶼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擴散的主要證據之一：

拉皮達陶器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菲律賓和印尼東部的群島，... 在菲律賓、Sulawesi 和 Timor 所發掘的若干遺址出土素面的陶器，有時帶有紅色陶衣，年代在西元前第三個千年的早期。這些遺址在年代上晚於以打製石片和石瓣工業為代表的先陶器文化傳統，顯示具有製陶、畜養動物、以及磨製貝鏟和石鏟和航海能力的人群的移入和散佈。從語言上來看，我們可以將之歸屬於早期南島語的人群。(頁 45-46)

以後，Barbara Thiel (1988) 依據在菲律賓呂宋島卡加延河谷 (Cagayan Valley) Arku Cave、Musang Cave 和 Lal-lo 三處遺址發掘所得及菲律賓其他各地所出土的考古資料，也主張南島語族原居於臺灣，經過菲律賓而擴散到太平洋的群島。他推測菲律賓的史前陶器傳統都是源於菲律賓以外之地，尤以臺灣最為可能。他將菲律賓的陶器和相關遺物與臺灣的作比較，認為：

〔臺灣的〕三個文化和菲律賓各個文化之間都可以發現相似性。一些 Tabon 和 Sa Huynh-Kalanay 傳統的早期陶器是帶有繩紋裝飾的，而此一傳統中的若干其他器物又與「龍山形成期文化」相似。然而，最相似的卻是在「圓山」

和 Lal-lo 之間。Lal-lo 的陶器也與東南亞之外的其他地區相似，其中之一是 Micronesia。一些 Lal-lo 的陶器裝飾也與 Marianas 的紅陶非常相似。Lal-lo 的陶器裝飾與 Melanesia 的拉皮達陶器上的劃紋裝飾也很相似。其陶器器形也類似。拉皮達的年代要晚於 Lal-lo 的早期年代。（頁 126-127）

然而，對於上述 Blust, Bellwood 和 Thiel 等人的看法，Solheim（1988）提出了質疑。他認為臺灣在南島語族的移動上不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臺灣和菲律賓的呂宋島之間也不存在緊密的史前文化關係。

〔臺灣和菲律賓之間的海域，〕在冬天的時候，東北季風非常強勁，沒有航海的人願意冒險，除非東北方有陸地保護。在夏天的時候，風和洋流都是向北行的，所以在颱風季節開始前，從呂宋向北到臺灣似不是問題，但是往南走則有困難。在換季的時候，風也許不是很大，但是海流經常是朝北走的，臺灣和呂宋之間雖不至於完全不能航行，但是也很困難，而從呂宋到臺灣也許容易些。（頁 81）

他並指出，目前的考古資料並不支持南島語族自北向南移動的說法，而菲律賓的陶器與太平洋群島中的拉皮達陶器並無直接的關係；Bellwood 所說 6000 多年前華南種稻的農民向臺灣和菲律賓北部擴散的說法，亦不符考古資料的事實，因為臺灣迄今所發現最早的稻米，距今只不過 4,000 多年。

此外，William Meacham（1988）雖然不否認臺灣與菲律賓在史前文化關係上的緊密性，但是他認為南島語族大約是在 10000 到 5000 BC 之間，由南方的菲律賓向臺灣擴散。他所持最主要的證據之一是臺灣的長濱文化和菲律賓的石瓣和石片工業傳統在年代模式上的相似性。

由於臺灣的地理位置正當東／南海古地和大巽它群島古地之交，在兩地人群和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可以提供重要的證據。而長濱在此點上似與之密切相關，因為它顯示了一個穴居的舊石器文化從更新世一直延續到了全新世，幾乎與所有菲律賓的洞穴一樣，但是這種情形卻完全不見於中國大陸。（頁 102）

所以，從上述的討論來看，南島語族的擴散，不論是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菲律賓都是居於路途之中，那裡的考古資料對於不同假說爭論的釐清，應該會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菲律賓的考古工作還有所不足，已有的考古資料，在這個問題上尚無法作出較為具體而深入的探討。

總之，就以往這麼多的討論來看，臺灣與其周邊的中國東南沿海和菲律賓，在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上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然而這一地區在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過程的各類假說中，之所以會被南轅北轍地解釋成南島語族的「頭」或「尾」，其癥結還是在於證據的不足。在有限的證據下，持不同看法的學者，面對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糾結了人群、語言、文化與生物基因各種面向，又沒有任何文獻可徵的問題，就只得各自聚焦在對其解釋有利的證據，而忽略了其它。Meacham（2004：62）批評「出中國假說」，說：「went too far with too little evidence（以有限的證據作過度的解釋）」。其實公平地說，這句

話也何嘗不適用於其它各假說！因此，我們目前只能期待：隨著新資料和新證據的逐漸累積，有朝一日終能出現更接近歷史過程，並能廣被接受的解釋。

四、近來臺灣及其周邊地區考古的新發現

近年來，在臺灣及其周邊中國大陸東南和菲律賓一帶，若干考古的新發現，對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具有很重要的意涵。

(一) 臺灣地區

近年來，臺灣地區的考古，由於參與甚多文化資產保存的遺址調查和搶救發掘工作，以致於有不少新的發現⁽⁴⁾。其中有三項，與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有關，較受矚目。其一是大坌坑文化的新發現，其二是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其三是與現在臺灣原住民可直接連結遺址的發現。

1. 大坌坑文化的新發現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考古遺址搶救工作⁽⁵⁾，在南關里和南關里東兩處遺址發現了大坌坑文化的遺存。南關里遺址位於現今南科奇美電子 LCM 廠地下，面積在 3 公頃左右，地層中共見有上下二個內容相似的堆積層，埋藏深度分別約在海拔-1.1 及-1.6 公尺左右，距現在地表約 6-7 公尺。南關里東遺址則位於園區水 1 及公 14 用地下，面積約 5 公頃，地層中則見有 3 層內容相似的文化堆積層，埋藏深度分別約在海拔 0.5、0.1 及-0.3 公尺左右，距現在地表約 6 公尺。兩遺址所測得定的 C-14 年代大致在 4200~4800 年間，樹輪校正最早可達距今 5000 年前，應屬於大坌坑文化的晚期。

這兩處遺址出土大量遺物和遺跡。遺物包括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貝器等文化遺物，以及動物、魚貝類和植物種子等生態遺物。陶器中除少數陶紡輪，都是容器和器蓋。陶容器按顏色和質地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暗褐色夾砂陶為主，坯體屬和石英、貝屑和火成岩屑，器型主要為短矮口緣球體圓底罐及折肩角轉平底罐，自頸折以下通體飾繩紋，部份在頸折下方另施加一圈貝印紋，口緣內側偶施直條紋紅彩。第二類為紅褐色泥質陶，外

(4) 參見《2004 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報告集》、《2005 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報告集》、《田野考古》，及其它若干以出版的考古報告，如劉益昌《宜蘭縣大竹園遺址初步調查報告》（宜蘭文獻叢刊 2，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3），劉益昌《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基地考古遺址調查計畫報告暨附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何傳坤《臺中縣營埔遺址發掘報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6），及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先民履跡——南科考古發現專輯》（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2006）等。

(5) 此項考古工作，係由筆者主持，從民國 85 年開始，迄今已達十多年；所發現的遺址已有 58 處，其中有 34 處進行了搶救發掘，依其發掘時間先後分別為：道爺、五間厝、三抱竹、北三舍、南關里、五間厝北、右先方、石頭埔、南關里東、五間厝南、大道公、牛屎港和道爺南等。這個契約考古工作¹，歷時之久、耗費人力之多，以及發掘面積之大，在臺灣考古學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因此，所獲得的工作成果，也至為可觀。目前，從上述遺址中所辨識出來的考古學文化，包含大坌坑文化、牛稠仔文化、大湖文化、蔦松文化、西拉雅文化和明清漢文化，涵蓋了所有臺灣南部地區的主要考古學文化；而各個文化，又可能進一步依其年代、空間分佈和物質特徵，細分為不同之期相。各處遺址中所出土的遺物和遺構，可謂異常豐富，其類別包括陶器、石器、骨角器、鐵器等文化遺物，植物種子和木頭等生態遺物，以及墓葬、建築遺跡、溝渠和灰坑等遺構。這些資料的多樣性及其在時空上的變異性，不僅是為臺南地區的人類開發史提供了具體的資料，對於整個臺灣的史前史，甚而在某些課題上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史前史，也因為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而備受關注。

表常抹光滑的陶衣。器型有罐、瓶、鉢、豆、蓋等；罐形多鼓腹圓底，口緣及肩折上方多飾以彩繪及刻劃紋裝飾，肩折以下飾以繩紋；豆則由帶有水平口緣的盆及帶有鏤孔的圈足組合構成，盆體多飾繩紋，常見肩折。第三類則為淡褐色泥質陶，器型主要為鼓腹罐或釜形罐，通體或肩折下飾繩紋，少見施加劃紋者。

石器種類有打製或磨製的石斧、石鋤、石鏟、石鑿、石刀、石鏃、石打棒和石網墜等。大多數石斧、石鋤、石鏟、石鑿是選用來自澎湖的橄欖石玄武岩製作而成；少數石鏟、石鑿是以來自東部的玄武岩質安山岩、安山岩及玉石製成；至於石鏃，是以板岩和頁岩為材料，網墜則以砂岩打製而成。在骨角貝牙器中，以大量貝刀，最具特色，是取用雲母蛤（*Placuna placeta*）等外形較為扁平的貝殼

生態遺物，非常豐富而多樣，其中貝殼數量最多，主要是生長於河口或潮間帶之牡蠣、蜆類、魁蛤、簾蛤、海蜷等以及部分來自淡水的田螺。除此之外，還有鯊鮫、鋸鱗、魴魚、各類硬骨魚類、龜、鼈、蛇等爬蟲類，以及豬、鹿、犬、鼠等哺乳類之骨骸。其中完整犬類的骨架，反映當時部份的犬隻是被人類所豢養。在植物遺留方面，發現的種子中，以碳化的稻米和小米數量最多，顯示這兩種作物顯然是當時人類的主要作物和食糧。除此之外，苦楝與豆科等植物的遺留也甚多。

在遺跡方面，出土具有規律性分布之柱洞遺存，可據以推測當時居民所住的可能是干欄式的房屋；同時根據柱洞和貝塚之空間分布，也可推測當時聚落的區塊格局。此外，從遺址所存在的地層堆積狀況，也可推知當時的聚落是位居濱海之沙丘環境。此外發現了為數甚多的墓葬，一般皆位於聚落內，成集叢分布，以仰身直肢為主要葬式，但是也見屈肢的葬式。葬具有木質棺木，部分並放置陶容器，貝珠、貝環、貝項鍊和貝耳飾等身體裝飾品作為陪葬品。有的墓葬死者的口鼻，覆以雙孔貝，似乎反映一種特殊的葬習和宗教觀念。這些遺跡，結合其他生活形態的證據，顯示當時的人類可能已經有了比較定居的聚落。此外，墓葬中人類骨骸，也顯示當時人類有拔牙（上顎左右之側門齒及犬齒）和馘首的習俗。

上述這些大坌坑文化的新發現，不但大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大坌坑文化內涵的瞭解，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蘊含的一些新線索，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找到個文化的來源地。

2. 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

臺灣西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大量的橄欖石玄武岩石器，而關於這些石器的石材來源，國分直一（1940）早已推測是來自於澎湖群島。但是關於確切的石材採集地點，並不清楚。直到最近澎湖七美島上發現了史前石器製造場遺址，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

筆者於 1983 年在澎湖七美島發現了南港遺址並作了試掘，當時即推測此為一處石器製造場遺址（Tsang 1992），但受限於經費和時間，未能進一步研究。2000 年 5 月臧振華與夏威夷大學考古學家 Barry Rolett 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葉學文博士等人前往七美南港遺址採集玄武岩石器標本和玄武岩地質標本，準備作 X 射線螢光分析，以找尋臺灣

和澎湖所發現玄武岩石器的礦源時，又在七美島上發現了東湖和西北灣兩處石器製造場遺址。這些石器製造場遺址規模龐大，暴露大量石器的原料、廢料、成品和工具，在臺灣尚屬首次發現，甚為珍貴。（臧振華、洪曉純 2001）

2002-2003 及 2005 年筆者在國科會及澎湖縣政府之支持下，又分別在七美島的南港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大量陶片、石器及製造石器所產生的廢料，以及貝殼，魚和獸骨。所發現的遺跡主要是墓葬。這些發現說明南港遺址是一處史前以製造石器為主要目標的產業聚落。從地層及所獲得的 C-14 年代估計，這個遺址的佔居時期，大約從澎湖菓葉期末期開始到鎖港期末期，即在 4500-3600 BP 之間。（臧振華、潘怡仲 2005）

七美島玄武岩石器製造場是在臺灣地區所發現年代最早的石器製造場，也是最大規模的石器製造場。不但第一次提供完整而具體的證據，可據以復原臺灣史前時代石器之製造技術，而且透過岩石礦物成分之分析比對，證明臺灣西南部所發現的史前玄武岩石器都是來自澎湖群島，提供了臺灣和澎湖之間史前時代交易之具體證據，但是更有義意的是：這個發現透露了四千多年前，人類已經具有為開採自然資源而進行遠距離海上航行和交易的能力，對南島語族的擴散問題有重要的意涵。

3. 與現在臺灣原住民可能連結遺址的發現

現在臺灣原住民的歷史被認為可以上溯到史前時代，不過個別原住民族群與個別考古文化之間的連結，始終缺乏較為清楚的資料。雖然，如前所述，Ferrell 曾將臺灣的幾個主要原住民族群與個別的史前文化作了連結，但是其證據缺乏說服力。以後，考古學家依據器物形制的相似性、分布區域的重疊性和時代上的接近性，推測臺灣一些鐵器文化的主人，有可能即是今日臺灣原住民某些族群最近的祖先。例如，有考古學家認為十三行文化與平埔族之一的凱達格蘭族有密切的關連性，他們所依靠的主要證據，除了時代上的接近，兩者的陶器都以方格印紋為特徵，而且活動區域都是在臺灣北部海岸一帶。近來亦有學者從語言或人體形態上進行研究，企圖作更充份的驗證。其他如分布於臺灣西南部的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的關連，和分布於花東海岸一帶的靜浦文化與阿美族的關連，也都是基於類似的證據。但是，嚴格的講，這些證據都還值得商榷。考量幾個世紀以來，臺灣原住民族聚落遷徙的頻繁和文化變遷的快速，有關考古文化和現存族群連接，還需要有更堅強而直接的證據。近年來一些年代較晚遺址的發掘，如臺南南科大道公遺址（臧振華等 2006）、宜蘭淇武蘭遺址（陳有貝 2005，2005）、臺東舊香蘭遺址（李坤修 2006）、臺東僅那鹿角遺址（李坤修 2005）、臺中南勢坑遺址（屈慧麗 2004）及臺中鹿寮（何傳坤、劉克竑編 2005）等，都發現了與現存原住民族群可能連結的具體證據。下面僅就大道公、淇武蘭與舊香蘭三處遺址略作介紹。

（1）南科園區所發現的西拉雅文化與西拉雅族的連結

臺南平原一帶是平埔族西拉雅族的主要活動地帶，但是過去除了文獻和民族誌紀錄，還沒有發現具體的考古資料。南科的考古工作在大道公遺址發現了密集的西拉雅文化遺留。該址面積約 3 公頃，位於南科園區大洲排水溝接近南 134 道路附近與學者所推測新港社之位置接近，故疑為新港社的遺留。出土遺物有：類似蔦松文化的紅褐色帶繫圓底陶容

器、陶支腳、骨角器、鐵器、玻璃器，瑪瑙豬，以及白瓷器、青花瓷器和醬釉硬陶等。C-14 年代在距今 300-500 年之間。（臧振華等 2006）

（2）淇武蘭遺址與噶瑪蘭族的連結

2001 年 6 月，宜蘭「礁溪鄉得子口溪第六期治理工程」施工人員，在二龍村淇武蘭河新建閘門附近，挖出許多人獸骨骸、陶瓷器物、房屋結構等，經考證文獻資料，「淇武蘭」是蘭陽平原上史有可稽的噶瑪蘭人舊社。宜蘭縣政府委託臺灣大學進行了搶救發掘，出土遺物的文化層分為上、下二層。下文化層在海平面下 1.2~1.5 公尺出土的夾砂陶，年代在 1300 至 800 年之間，而上層則在海平面上下 20~30 公分，年代距今 500 至 100 年之間。主要的發現包括：

- A. 上下層都出土木柱遺留，以上文化層較多，成規則性的排列方式，顯示干欄式的建築形式。
- B. 所發現的墓葬，上下層有異。上層墓多為蹲距葬，部分為側身屈肢，更少為仰身直肢葬姿；在葬儀方面，多為一次葬，少數則有二次葬的情況。葬具為木棺或草席，墓葬多有陪葬品，有幾何印紋的陶罐、瑪瑙珠和玻璃等。下層葬姿似不一致，多二次葬，隨葬品宜陶器為主，葬具主要為石板。
- C. 文化遺物有陶器、瓷器、石器、木器、貝器、骨器、金屬器，以及玻璃與瑪瑙飾物。陶器包括三種類別，第一類為陶質較軟，素面或帶方格印紋的陶器。第二類為典型的幾何硬紋陶，陶器薄而質地堅硬。第三類為帶釉之硬陶；其中第一類主要出現在下文化層。

淇武蘭遺址最重要意義之一是：可確認遺址之所在為歷史文獻中所記載的平埔族噶瑪蘭民族舊社遺址，同時將噶瑪蘭族在宜蘭之歷史上推到 1300 年以前。（陳有貝 2005）

（3）舊香蘭遺址與排灣族的可能連結

近年來在東海岸發現了一個新的考古文化，其陶器類似卑南文化，但其把手呈現獨特之三角形，同時陶器之紋飾係以刺點紋所構成的幾何形帶狀花紋。具有這樣特徵的遺址主要出現在臺東卑南大溪以南之面海山坡上，包括初鹿遺址、三和遺址、老番社遺址、射瑪干遺址及山棕寮遺址，在卑南遺址也出現了具有此一特徵之文化層，並一併出土鐵器及玻璃珠等遺留。證明已進入鐵器時代，年代在 2310-1980 之間。學者將之從新石器時代的「卑南文化三和類型」，改稱為「三和文化」。（葉美珍 1999、李坤修 2002）

近來位於太麻里海濱之舊香蘭遺址因受杜鵑颱風之海浪侵蝕，暴露出文化層。考古學者進行了搶救發掘，出土了相當豐富，年代在 2300-1200 年前之間「三和文化」之考古資料。在遺物方面包括：陶器、石器、石模具，金屬器、玻璃器、骨角器及一些生態遺物。遺跡主要是石板棺，其結構與卑南遺址所出土的有相似之處，亦有相異性。

此一遺址最大的意義之一，如李坤修（2006）所言：

舊香蘭遺址的出土物中，石板棺、石器及陶器的特徵充分顯示這遺址承續了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的血脈、而百步蛇、琉璃珠、模具青銅器等要素的出現，凸顯了它與原住民文化的直接關連，因此，舊香蘭遺址毫無疑問的就是扮演臺灣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之間所謂的「失落的環節」的角色。卑南文化的去處與原住民文化的起源問題，似乎在這遺址上找到了答案。」其中最具有意義的發現之一是：在陶器和石器上出現了百步蛇之紋飾，與今日排灣族所常用之百步蛇紋飾，甚為相似，顯示該文化與排灣族之間的可能關連性。（頁 42）

（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考古在中國一向是比較落後的地區，考古報告貧乏。但是近一、二十年以來，這種現象已經有改善的趨勢。最明顯的發展就是各個新文化的大量發現和區域性文化發展序列的確立。以閩粵沿海地區為例，1960 年代在福建省所首先發現的「曇石山文化」，於 1978 年以後，又進行了數個遺址的大規模發掘，不僅豐富了「曇石山文化」的內容，而且對該文化的內涵、特徵、年代、分佈地域及其文化性質等都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從而使「曇石山文化」的考古研究步入了一個新階段（福建省博物館 1983）。而 1980 年代以後，先後又調查和發掘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如平潭殼丘頭（福建省博物館 1991），閩侯庄邊山（福建省博物館 1998）、霞浦黃瓜山（福建省博物館 1994）、東山大帽山（福建博物院 2003）等，更豐富了福建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內涵，建立起從殼丘頭到曇石山下文化層、曇石山文化、黃瓜山、黃土崙文化的發展序列（林公務 2005）。此外，在接近福建海岸的金門與馬祖也都有了新的考古發現。金門的金龜山遺址已經過數次發掘，出土兩個文化層，上層年代距今約 7320-7200 年前，下層約 8980-8600 年前，都早於閩臺兩岸新石器遺址迄今所知的年代，其文化類緣關係也還不清楚（陳維鈞 2005）。馬祖熾坪隴遺址經過了一次試掘，兩次發掘，出土遺物有石器、陶器、貝殼及動物骨骼。遺址包含了一個以上的文化層，年代在距今 6000 到 4000 年之間。發掘者認為其文化類緣可能與福建殼丘頭遺址和曇石山下層相類，但仍存在差異。（游桂香 2005，王花弟 2005）

在廣東海岸地區，1970 年代之後所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依數量、規模和內涵之豐富性來看，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最。迄今在環珠江口兩側及其島嶼上所發現的史前遺址（包含沙丘遺址和貝丘遺址），為數超過百處，其中有不少是經過了考古發掘，較重要者有深圳的大黃沙、咸頭嶺和大梅沙，珠海的東澳灣和後沙灣，香港的東灣仔、深灣、大灣、白芒和西貢沙下。依據商志禛（商志禛等 2000，2006）的分析，珠江口的史前沙丘遺址，不僅在地理分布上有共同性，在文化內涵上，亦有共同的特徵。

陶器方面的特徵包括：（1）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僅佔少數。（2）一般採用手製。（3）器類有釜、罐、鉢、碗、盤、器座等，以圜底器為主流；陶盤帶彩，為直口圓唇圜底，下附圈足，有波浪紋和鏤孔。（4）陶釜、罐的形制多為敞口折沿圜底。（5）陶器紋飾以繩紋和劃紋為主。（6）彩繪紋圖案以幾何圖案為主。石器的特徵為：（1）有磨製石器、打製石器，也有一定比例之石片。（2）斧、鏃多有發現，為通體或局部磨光，可分長

身和短身梯形兩類。(3)有段或有肩的斧鏃數量不多，但普遍存在。(4)礪石多，可分為平礪石和帶溝礪石。(5)網墜為橢圓形，腰部凹入。

在聚落型態方面，所有的遺址都位於海岸、島嶼的沙堤或沙洲上，前面是大片沙灘，背後是低丘，或山坡，海拔一般約 7~10 公尺，離海岸線幾十公尺到上百公尺不等，附近有小溪或小河入海。從部落的佈局來看，當時的住屋可能是干欄式房屋，分佈雜亂，灶坑無特定形狀，用石塊或鵝卵石堆砌而成。文化層不厚，且呈現斷續之堆積，推測屬於濱海而分散的季節性聚落。在生業型態方面，由於珠江口地區有溫暖濕潤的氣候和豐富多樣的海陸資源，故當時人類以漁獵為主要的經濟來源，農業不發達。

關於這些遺址的年代，據商志禛認為珠江三角洲地區遺址的年代，應與珠江三角洲地貌發育的年代大致相近，都在距今 6000 年以內。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珠江三角洲史前遺址調查組（2000）將該地所發現的史前遺址以距今 4000 年前為界，分為兩期：

早期遺存的上限可達距今 6000 年乃至更早一點，遺存中多夾砂繩紋陶器，不見幾何印紋陶，但在比較早的階段有彩陶和白陶。晚期遺存以曲折紋、雲雷紋等幾何印紋陶器為特徵，下限可抵距今 3000 年左右。（頁 398）

至於更南方的廣西南部北部灣沿海及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一帶，近年來也有不少新的考古工作。環北部灣沿岸共發現 125 處遺址，雷州半島 20 餘處，海南島 200 餘處，其中包含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河旁臺地貝丘和海濱貝丘，新石器中期的濱海沙丘，及新石器晚期的大石鏟文化遺址。其中新石器中期的濱海沙丘遺址，都分布在濱海的沙丘，年代約距今 6000-5000 年前，出土陶器以手製夾砂粗陶為主，器形有圜底釜、平底罐、圈足碗、鉢、紡輪和網墜等。表面磨光有紅色陶衣、繩紋和劃紋等裝飾，不見印紋。石器以梯形磨製石斧、石鏃和礪石為主，也有少量有肩石斧。此內涵與兩廣同時期遺址的關係十分密切。（廖國一 2006）

（三）菲律賓地區

菲律賓的考古工作主要始於 1943 年 Beyer 在菲律賓呂宋島發現更新世晚期之石器（Solheim 1969）。1950 年代以後，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在菲律賓進行比較有系統的工作，包括：Solheim（1960）於 1950-1954 年間，在菲律賓開始進行有系統的甕棺葬調查；Robert Fox（1959, 1970）在呂宋島 Batangas 省 Calatagan 遺址所進行的長期發掘，及在菲律賓巴拉望島西岸 Quezon 市附近的石灰岩洞穴所進行的調查和發掘；美國密西根大學的 Karl Hutterer（1982）於 1970 年在菲律賓所進行的研究計畫；美國愛荷華大學的 Richard Shutler（1979）在菲律賓呂宋島的 Liwan Plan 進行考古調查。除了以上這些主要由西方人所進行的考古工作，菲律賓的考古工作屈指可數。

1970 年代以後，在最接近臺灣的呂宋島，開始有了較多的考古工作。1971 年菲律賓國立博物館在 Cagayan 河谷下游東岸 Lal-lo 之 Magapit 發現並試掘了一處新石器時代的貝塚遺址，出土帶有印紋和劃紋的陶器。在當時，這些陶器對菲律賓新石器文化，及其與臺灣和華南的關係被認為是極具意義的（Fox 1971）。1972 年，菲律賓博物館的考古人員繼續對 Magapit 貝塚進行發掘，出土磨製石鏃、頁岩石珠、土質飾物、陶紡輪和陶片。成為菲律賓

第一個正式發掘的新石器時代的露天居住遺址，其在菲律賓文化史上的意義，及其與其它地區的關係，引起考古學者持續的注意（Cabvarilla 1972）。

1976年至1977年菲律賓博物館在距Liwan Plain約15公里的Penablanca石灰岩區進行洞穴遺址的調查，發現了洞穴和岩蔭遺址97處，並發掘了其中8處。其目的是要了解該地區舊石器文化的時空架構。Ronquillo（1981）對Rabel Cave發掘出土石片器的技術分析顯示，此類石器延續的時間甚長，而該洞穴的C-14年代大約從4200至2900 BP。

1977年，Barbara Thiel也至Cagayan河谷進行考古研究，在Penablanca石灰岩洞穴地區發掘了Aku和Musang兩處洞穴，並在Cagayan下游北岸的Lal-lo發掘了一處貝塚。Aku是一處墓葬遺址，出土包含甕棺葬在內的六種二次葬，伴隨出土陶器、珠子、耳飾、貝環、石片器、樹皮布打棒和紡輪。C-14年代在6500至2900 BP之間。Musang洞包含兩個文化層，第一層包含打製石片器、貝殼和獸骨。C-14年代是在11150至9000 BP之間。第二層出土物除了第一層相同的東西之外，還出土陶器、人骨、珠飾和黃銅。C-14年代顯示此文化層開始於5200至4000 BP之間。Lal-lo遺址有很厚的貝塚堆積，但其中文化堆內涵無甚變化，獲得兩個C-14年代，較早的是3790±100 BP，較晚的是390±110 BP（都經校正），代表此遺址至少延續了3,400年。出土物主要是陶器，以紅褐色陶為主，但也有灰黑陶，紋飾以圓圈、刺點和刻劃紋為主，發掘者認為可能受到臺灣圓山文化的影響（Thiel 1986, 1987, 1988, 1989）。

此後數年，Cagayan河谷並沒有主要的考古工作，直到1986年，日本上智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開始與菲律賓國立博物館合作進行「Lal-lo考古計畫」，由小川英文（Hidefumi Ogawa）、青柳洋治（Yoji Aoyai）、田中和彥（Kazuhiko Tanaka）和Melchor L. Aguilera等在Cagayan河谷下游Aparri、Camalaniugan和Lal-lo一帶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其目的是要弄清楚Cagayan河谷下游史前文化的年代學（Aoyai, et al. 1993, Ogawa, et al. 1996）。

綜合以上所述，有關Cagayan河谷的考古工作始自1970年代初，迄今雖有數個考古研究計畫在此進行了一些工作，也發現或發掘了從舊石器以至金屬器時代的少數遺址，但是在地區的文化年代學方面，迄今也還缺乏一個較為清楚的區域性面貌；而有關史前文化的類緣、變遷和生活方式等課題，也還有待更多的研究。

1996年-2001年間，筆者和菲律賓博物館副研究員Rey A. Santiago所共同主持的呂宋島北海岸地帶的考古工作⁽⁶⁾，在呂宋島北海岸Cagayan河下游河谷、Abulug河下游河谷，以及Aparri和Laoag之間的海岸平原階地進行考古調查，共調查和發現了97處考古遺址和地點（Cagayan 52處，Abulug 45處），並進行了Muguel Supnet和Leodivico Capina兩處遺址的試掘及Nagsabalan遺址的發掘。依據這些調查所獲得的文化遺物、地層堆積層位和C-14年代的測定數據，初步建立起呂宋島北海岸四個群史前文化遺址群：

第一群是以出土礫石石片器和石片器為特徵的「打製石器」遺址。石子器都是利用石英岩或砂岩質橢圓形石子的一端打剝出刃端。石片器主要為石英、砂岩或燧石打製的小型

⁽⁶⁾ 參加此一計畫工作的除兩位主持人之外，先後曾有張光仁、劉克彥、洪曉純，Jose Santiago, Sheldon Clyde B. Jago-On。

石片，包括切割和刮削器。這些遺址可能代表在該地活動的最早人群，估計年代在 5,000~6,000 BP 以前。

第二群是以出土素面、偶帶簡單線條劃紋或紅色陶衣的夾砂紅陶器為特徵。他們可能是當地最早使用陶器的人，年代在 4,500-5,000 BP 之間。

第三群以出土紅褐色和黑色陶器為特徵。陶器的紋飾較多，有壓印紋、圈點紋和刻劃紋。年代在 2,000 BP 間。

第四群遺址以出土素面無紋的紅色陶器、中國和暹羅瓷器，以及鐵器為特徵。應屬於鐵器時代，年代約距今 1,000 多年前左右。

三處遺址的試掘與發掘，也出土了相當豐富的資料。茲概述如下：

1. Miguel Supnet 遺址試掘

Miguel Supnet 遺址位於 Cagayan 河西岸，在臨河的地層斷面上，暴露出厚約兩公尺的貝塚堆積，從此斷面上所取的貝殼經碳十四測定為距今 5100±110 年前以及 4615±85 BP。因為這些年代數據比之前我們推測陶器在這些地區出現的年代要早，所以為了瞭解這個遺址脈絡，和陶器在地層中出現的位置，我們進行探坑試掘。共發掘兩個 2x2 平方公尺大小的探坑，發掘結果確定了這個遺址內涵主要由貝塚組成。其地層分層並不難判斷，可分為五層主要的堆積（地層自坑頂到坑底分為 I 到 V）。只出現少量遺留，包括少量打剝石片器和陶片。陶片只在上面三層中出現，主要特徵為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兩類，多為素面無紋，然而有幾件帶有紅色陶衣或簡單線性刻劃紋。對探坑地層中的兩件木炭標本和六件貝殼標本所獲得的年代，在距今 5100-4600 年前之間。

2. Leodivico Capina 遺址試掘

Leodivico Capina 遺址位於 Cagayan 河西岸，在河階斷層上，可見厚度約 3 公尺的貝塚堆積，其中一部份在道路建設時被鏟除。對 Leodivico Capina 遺址出土的兩件貝類標本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年代為 5730±100 BP 和 5480±95 BP。這兩個年代甚至早於 Miguel Supnet 遺址的年代。為了對這個遺址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進行了試掘，結果和 Miguel Supnet 遺址相同，主要由貝塚堆積組成。在第一個探坑中，貝塚堆積深達地表下 3 公尺，無法清楚的判斷並區隔層位，但是看得出時斷時續的木炭堆積。僅有少量物質文化遺留出土，包含幾件打剝石片器、石核、火燒岩塊和陶片。在上層 30 公分厚的層位中出現陶片。這些陶片主要可分為夾砂紅褐陶和夾砂灰黑陶兩類。夾砂紅褐陶以素面為主，雖然有些帶有紅色陶衣或刻劃紋。灰黑陶的數量稀少，大多在坑底層位中出現。對該遺址遺留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十個年代數據，在距今 6000 到 4800 年之間。

3. Nagsabaran 遺址發掘

Nagsabaran 遺址位於 Cagayan 河西岸 Zabaran Creek 小溪南側，在斷面上出現廣泛的貝塚堆積分佈，並有大量的陶片散佈在遺址地表上。調查時對貝塚堆積下層出土的一件貝類標本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年代為 2950±90 BP，比 Miguel Supnet 和 Leodivico Capina 遺址的年代晚了許多。為了對這個遺址的內涵和本質有更多的瞭解，在 2000 年 2 月 14 日到

3月16日及2001年7月9日到8月20日在此地進行兩季的發掘工作，總共對八個探坑進行發掘，主要是貝塚堆積，最深可達兩公尺。

所出土物質文化遺留，包含陶器、打剝石片器、磨製石鏵、玉環、陶耳飾、用骨頭或牙齒製成的裝飾品以及玻璃珠和石珠。陶片數量甚多，可分為兩個主要類型。第一類是表面帶有紅色陶衣的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大多為素面，但偶有刻劃紋和點刺梳紋的裝飾。器形有罐、鉢和帶支腳的盆型器。這種類型的陶器主要出現在較底層的層位中。第二種類型的陶器特徵主要是黑色、暗褐色或紅褐色的粗夾砂陶鉢和陶罐。容器的外部經常飾以條狀、波浪狀、交叉狀、圈點紋的幾何形刻劃紋及壓印紋，這種類型的陶器出現在較上層的層位中。

石器則以打剝石片器和石鏵為主。用燧石製的打剝石片器主要出現在較上層的文化層中。石鏵為方形，橫剖面呈梯形，主要出現在較下層的層位中，且伴隨紅陶出土。下文化層中出現玉環破片，較上層的層位中出現玻璃珠和陶耳飾。上文化層共發現七具人骨墓葬，葬式包含了直肢葬、覆臉罐，以及無頭骨的直肢葬等三種。

總之，根據陶器、石器和裝飾品的型態，遺址的年代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時期：早期的特徵為紅陶和石鏵，而晚期的特徵則是以黑、紅褐色陶、耳飾，以及玻璃珠為主。根據這個遺址的十九筆碳十四年代測定的資料，早期的年代可能在距今3400-2500年前，而晚期則在距今2200-1500年前。（臧振華2000，臧振華等未發表稿）

近幾年，菲律賓考古中一項最新的發現是 Peter Bellwood 於2002-2005年間在巴丹群島（the Batanes Islands）中的巴丹島（the Batan Island）和伊巴雅島（the Itbayat Island）所做的調查和發掘。從伊巴雅島 Torongan 洞穴所發掘出土的陶器，多為素面或帶紅彩，Bellwood 認為與臺灣東部屬於繩紋紅陶文化的潮來橋遺址相似，C-14 年代在4450-3300年之間。巴丹島 Sungegt 遺址發掘出土的陶器飾以紅彩、圈印紋和曲折紋，有的器身帶有把手。石器有玦碼形網墜，以及梯形或有段石鏵，年代約在3500-2500年前，Bellwood 認為這一時期，包含臺灣及呂宋島的因素。伊巴雅島 Anaro 遺址所發掘出土資料中，最顯著的是許多來自臺灣花蓮豐田玉所製造的玉器，同時陶器也有所改變。這三處遺址的資料，成為支持南島語族「出臺灣假說」的新證據。（Bellwood and Dizon 2005）

五、關於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問題的討論

如前所述，目前對於南島語族的起源問題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南島語族是源於中國東南沿海和臺灣，另一種則認為是源於東南亞的島嶼。雙方雖各持論點，但仍有待商榷。近來一些新考古資料的出現，使這個問題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下面試就近來臺灣及其周邊地區一些新出現的考古資料，提出幾個問題作討論。

（一）臺灣、巴丹與呂宋

Peter Bellwood 主要跟隨語言學者 Robert Blust 的擬測，認為原南島語是源於中國大陸，到達臺灣後，其中一支南島語向南移出，成馬來波里尼西亞語。所以，他從考古資料

上認為中國長江以南沿海地帶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大約在六千年前跨海到達臺灣，並再向南擴散。而他作此解釋的主要證據是帶有紅色陶衣的陶器。這種陶器見於臺灣的大坌坑/圓山文化傳統，也普遍見於太平洋的 Lapita 陶器上。Bellwood (1983-1985) 解釋：南島語族的祖先原來是居住在大陸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的農民，由於穀類農業的發展使得人口急速擴張，於是自六千年前開始向東南亞的海島移民。臺南科學園區屬於大坌坑文化晚期的南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出土了稻米和小米的遺留，使 Bellwood (2004) 非常欣喜地獲得了一項支持他的新證據。而巴丹島所發掘出來類似臺灣細繩紋陶文化的陶器和石器，特別是琺瑯形網墜，以及明顯是來自臺灣東部的玉器和板岩石器，使 Bellwood 更據以堅持他的假說。現在他依據巴丹島所建立的史前文化層序，認為距今 4000 年前臺灣東部的史前人類確實到達了巴丹群島，而這一人類的遷徙可以與語言學中「原馬來波里尼西亞語」的建立 (the Proto-Malayo-Polynesian) 或「福爾摩語沙以外南島語群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Extra-Formosan subgroups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連結起來。

但是，筆者以為，正是由於巴丹島的新發現，使 Bellwood 的假說面臨了問題。首先是關於年代的問題，過去 Blust 對古南島語的擬測，認為南島語從臺灣向菲律賓擴散的年代大約是在 5000 年前，而 Bellwood 同樣也以 5000 年前作為人類從臺灣向菲律賓擴散的年代。如今，考古資料顯示人類到達巴丹群島的年代確實不會早到大坌坑文化的年代，甚且晚到細繩紋陶文化的晚期，所以，最早當不會超過 4000 年前⁽⁷⁾，比過去所推測的年代，晚了幾乎一千年。而這一年代，甚而要晚於海島東南亞的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年代。例如：Ipoi Datan 與 Peter Bellwood (1993) 在婆羅州 Gua Sireh 遺址的發掘，從出土拍印紋、繩印紋和籃印紋陶器的地層中所獲得的 C-14 年代為 2334 BC，他們認為這是代表農業的南島語族的進入⁽⁸⁾；在沙巴，Bukit Tengkorak 遺址的陶器年代可以早到 4340 BC；印尼陶器出現最早的年代：在 Ulu Leang 1 是 3132 BC，Leuwillang 是 3047 BC，Uai Bobo 2 是 2160 BC。Ian Glover 在東蒂汶早其陶器地層中所獲得的年代在距今 4500-3700 年前之間 (Solheim 2006)。此外，筆者在呂宋島 Cagayan 河谷 Muguel Supnet 和 Leodivico Capina 兩處遺址進行試掘所出土的素面，偶帶簡單線條劃紋或紅色陶衣的夾砂紅陶器，其出土地層的 C-14 年代也可以早到 4500 到 5000 年前之間。如果，海島東南亞的南島語族都是由臺灣經過菲律賓一線擴散出來的，那又如何解釋這些早先到達島嶼東南亞的陶器文化？

其次是關於實際文化內涵的問題。Peter Bellwood 認為 Itbayat 島 Torongan 遺址所出土的文化遺物，特別是 Torongan 陶器的口緣風格、器形及紅色陶衣，與臺東杉原潮來橋遺址所出土屬於細繩紋陶文化晚期的陶器甚為相似，而認為可以證明是來自臺灣的移民。但是這樣的證據其實並不充分。臺灣的細繩紋陶文化時期，臺灣周邊沿海有相當活躍的海上活動，這可由澎湖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以及在綠島和蘭嶼都發現了細繩紋陶文化的遺留反映出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 Torongan 遺址卻完全沒有發現任何帶有繩紋的陶片。Bellwood 對此作的解釋是細繩紋陶文化的晚期，細繩紋在陶器上出現的比率已大為減少。

⁽⁷⁾ 雖然 Bellwood 依據 Torongan cave site 的 C-14 年代，將人類到達巴丹群島的年代放在距今 4500 年，但是從其陶器類似臺灣細繩紋陶晚期，又完全不見繩紋來看，其年代應不會超過距今 4000 年前。

⁽⁸⁾ 後來 Bellwood 改變看法認為這個年代是與說南亞 (Austro-Asiatic) 語的族群有關。

從綠島和蘭嶼都出現了細繩紋陶文化的遺址和遺物來看，鄰近的巴丹群島也出現臺灣細繩紋陶文化的遺址或遺物，並不令人詫異，但是以目前的證據來看，仍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還需要有更多的證據。同樣的，對於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史前文化的關係，洪曉純（Hung 2005）將呂宋島北部 Cagayan 河谷主要是 Nagsabaran 遺址所發現早期的陶器與臺灣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作比較，也是依據紅色陶衣與口緣風格的類似性，以及年代的相近，而認為：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即紅彩陶文化，很可能來自臺灣新石器中期文化的擴張發展，而其中又與臺灣東海岸細繩紋陶文化晚期，距今 3500 到 4000 年間的彩陶階段最有關連性。（頁 133）

筆者曾主持呂宋島 Cagayan 河谷的調查及 Nagsabaran 遺址的發掘，也確實覺得 Nagsabaran 遺址下層（C-14 年代約在 3500 BP 左右）所出土的陶器風格與臺灣的細繩紋陶文化的陶器有干相似之處，但是並非沒有相異之處，例如，Nagsabaran 陶器中常見的刺點加填白石灰 (lime inlay) 的特徵，完全不見於臺灣。這種特徵在海島東南亞和太平洋地的 Lapita 文化中有廣泛的分布，Solheim（2006）將之歸類為 Pre-Sa Huynh-Kalanay 陶器傳統，推論是在距今第五個千年（4000-5000 BP）時源於中南半島的沿海地區。因此，以目前的證據，認為可以將巴丹島的考古發現與呂宋島的發現聯繫其來，並進而支持南島語族從臺灣向菲律賓遷徙的假說，似乎還有待商榷。筆者認為從大約 4000 年前起，臺灣與呂宋島之間由於人群接觸與交易而產生文化交流和影響的可能性也許更大一些。

在上述巴丹群島的考古發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玉。在 Itbayat 的 Anaro 遺址，出土了十數件以臺灣東部豐田玉所製造的玉器（包括鏃、箭頭、刀）的破片和製造玉器的廢料。其出土地層的年代大約是在 2500 到 1500 BP 之間。另外在呂宋島的 Nagsabaran 遺址的下文化層也出土了臺灣豐田玉的手環。洪曉純（2006）並進一步搜尋在菲律賓的 20 餘處地點曾出土臺灣豐田玉的玉器，包括新石器時代和鐵器時代。這些資料顯示，從 3500 年前開始，臺灣玉已經從臺灣外銷到巴丹島和菲律賓一帶。近來，洪曉純（Hung 2007）等對越南沙瑩文化和泰國的史前玉器進行分析鑑定，證明也是來自臺灣的豐田玉。可見從三千多年前開始一直延續到一千多年前，在臺灣與中南半島之間的海域，可能有一涉及臺灣玉器的海上貿易網絡。而臺灣史前文化與菲律賓的巴丹群島和呂宋島的文化接觸是否有可能與這一海上貿易有關？

總之，筆者認為，Peter Bellwood 以巴丹島和呂宋島的新考古發現而欲進一步支持他的「出臺灣假說」，似乎還需要更為積極的證據。我們不能不考慮其間所可能涉及包括人群遷徙、人群的接觸、互動和貿易往來等多元因素所造成的複雜過程。此外，4000 BP 這樣一個相當「晚近」的年代，海島東南亞可能並不是處在新石器文化「真空」的狀態，等待來自臺灣的新石器時代農民。我們不能排除在同一時間或更早，具有農業和製陶能力的新石器人群，已從其它的路途進入。Mijares（2006）即依據呂宋島 Penablanca 洞穴遺址中紅色陶衣陶和黑陶併存的現象，認為南島語族進入呂宋地區並不必然就是單一的事件，也可能也有來自其它地區的文化或人群。

（二）起源地何在？

「出東南亞假說」、「慢船假說」，甚而「糾纏地帶假說」派的學者，強調南島語族是源自於島嶼東南亞本土。Solheim、Meacham、Oppenhemier 和 Terrell 等都認為南島語族是源於東南亞的土著，其開始發展的時間深度可以推早到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的初期。不過，這樣的論點，似乎並不受到現有考古資料的支持。我們目前完全無法瞭解原來住在海島東南亞的狩獵和採集者是不是說南島語，但是新石器文化係由外地將農業和製陶技術帶入到東南亞卻受到考古證據的支持。

以臺灣為例，Meacham 認為屬於臺灣先陶時代的長濱文化是代表來自菲律賓的南島語族，並在島內繼續發展。但是從目前的考古證據來看，尚不能支持這種說法。因為長濱文化與臺灣迄今所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大坌坑文化之間，並無明顯的關連和發展的關係。所以，臺灣的南島語族應該是源自臺灣的新石器文化。如前所述，最近宜蘭淇武蘭、南科大道公和臺東舊香蘭等幾處遺址的發掘，不但把考古文化與現生南島語族群連結起來，而且更可將其發展的歷史上推到一千多年前，甚而更直接聯繫到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而臺灣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底層便是大坌坑文化，這個文化繼續發展成細繩紋陶文化，並擴散到臺灣的全島—從西部到東部、從海岸到內陸，以及從本島到其周邊的小島，而成為臺灣後期史前文化的主要基幹。所以，如張光直所推測，大坌坑文化可能代表臺灣最早的南島語族的意見，無疑是可以被接受的。而 Ferrell、Shutler 和 Marck、Bellwood 及 Blust 等學者結合考古學與語言學的資料，推測大坌坑文化可能代表最早的原南島語族（Proto-Austronesian）人群從中國大陸來到臺灣也是合理的，但是如前所述，關於大坌坑文化的來源地，以及其在南島語族起源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爭辯。

最近臺南科學工業園區大坌坑文化的發現及其所提供的一些新線索，幫助我們更清楚地找到了這個文化的來源地，從而可以更確切地指明南島語族的老家鄉，而這個地點最有可能是珠江三角洲一帶。1992 年筆者（Tsang 1992）曾指出澎湖群島上的大坌坑文化與廣東沿海具有繩紋陶器的文化具有多方面的相似性；除了陶器的形制和文飾，包括繩紋、刻劃紋和彩繪紋之外，石器的類型亦非常相似，但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年代，以及生活方式和適應型態上的相似性；所以，從文化整體的面貌和內涵來看，澎湖群島粗繩紋陶文化最可能的來源地是在廣東沿海。以後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自 1990 年代以來爆發性增加的考古材料（鄧聰、區家發 1991），似乎更加支持這個看法。

將南科所發現大坌坑文化資料與珠江三角洲的早期遺址相比，可以發現在生業和聚落型態上，兩者都是以適應濱海的生態環境為特徵，其生活方式頗為類似（商志禛、譚世龍 1990，林小云 1998）。這點其實也與福建的殼丘頭文化也相差不大。但是從工具套、生業形態和聚落型態所呈現的整體風貌來看，則大坌坑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的類同性顯然要大於殼丘頭。而出土遺物中的幾項指標性的特徵，如筆者最近在另一篇文章（2006）所指出，更加突顯了這樣的印象：

1. 珠江三角洲早期沙丘遺址的若干類型之陶器風格與大坌坑非常相似。例如深圳大黃沙和大鵬咸頭嶺，以及香港和澳門等地若干沙丘遺址所出土的陶釜和陶罐，其形制、胎質和紋飾特徵幾乎與南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的陶器難以區別。而這種普遍的相似性卻不常見於福建沿海的遺址。其實，以肉

眼觀察珠江三角洲早期沙丘遺址和福建殼丘頭文化遺址所出土的陶器，可以立刻感受到福建殼丘頭文化的陶器與臺灣大坌坑文化陶器的相異度遠大於相似度，而珠江三角洲則是相似度大於相異度。另外，珠江三角洲早期遺址的陶器類別中，除了紅陶和彩陶之外，還有少量的白陶。而白陶在大坌坑文化的陶器中亦有所發現，但是卻不見於殼丘頭文化。

2. 石鏃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沙丘遺址和福建殼丘頭文化遺址的石器中都是最主要的石器類別，將南科南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所出土的石鏃與之比較，可以發現，與前者的相似性更大。殼丘頭文化的石鏃多為短身小型的長方形或三角形石鏃，而珠江三角洲的除了短身的之外，還有長身型長方形的，與南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出土的所出土的石鏃相當類似。此外，有肩斧、鏃普遍存在於珠江三角洲的早期沙丘遺址中，但幾乎完全不見於殼丘頭文化，而出現於南關里遺址。（頁 348）

（三）多元擴散路徑

如果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南中國海北岸地帶是南島語族的主要起源地，那麼它向海外擴散的路徑，應該有多種可能性。跨海到臺灣可能僅是其中之一，但是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這個文化到達臺灣後，僅在臺灣環島和周邊移動和發展，要到發展成繩紋陶文化之後，才開始向南逐漸與菲律賓地區有所接觸和互動。不過，這個行動是否單線地促成了南島語族繼續在海島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擴散，目前的證據尚有待加強。

另外一個可能性則是從珠江三角洲沿海岸經過廣西南部海岸和海南島向越南海岸遷徙。考古資料顯示，從珠江三角洲開始向南，在廣西南部北部灣、雷州半島、海南島，以至越南海岸，都出現了與珠江三角洲相似：年代同樣在 6000 - 5000BP、出土相似的器物組合、都有繩紋陶器，並且都是適應海岸環境的遺址。廣西南部北部灣、雷州半島、海南島的資料已經在前面介紹。越南北部，在面對海南島方向的海岸，於 1977 年發掘了凹丘遺址，其面貌與 1926 年由法國考古家所發掘的多筆遺址相同，遂將之命名為多筆文化（Da But culture）。這個文化有別於位處內陸地區的和平文化及北山文化，是一個全新世中期適應海岸沼澤和湖泊環境的一個文化，C-14 年代在 6000-5500 BP 到 5000 BP；這個文化的陶器以繩紋和拍印紋為特徵，並首次出現了磨製的方角石鏃，有砗磲形石網墜和紡輪。（Nguyen Viet 2005，阮文好 2006，Nishimura Masanari 2006）多筆文化的內容和風格與珠江三角洲和廣西沿海以出土繩紋陶為特徵的沙丘遺址相當類似。說明了在珠江三角洲到越南海岸之間的廣大海岸線上，於 6000-5000 BP 之間，曾居住著具有相同文化面貌的居民。這些居民在海上進行漁撈活動，加上南中國海魚類資源極為豐富，並有島、礁、灘、沙散布可以作為跳板和暫泊休憩之處，因此，有可能促使他們沿著越南海岸或直接跨越南中國海航行到巴拉望島和婆羅洲。

其實，這條海上航路，早已被古代中國的移民所經常使用。海南島的僑民目前廣泛散布在東南亞；據歷史資料，早年海南島向南洋移民所乘坐的帆船主要由海口及文昌之港口出發，取道瓊州海峽往西，再南下走西貢、曼谷和星洲等處；另一條航線是由清瀾、卜鰲、籐橋、三亞等港口，直接乘東北季風過海南（蘇雲峰、符駿 1986）。而考古資料似乎也支持早在全新世中期中國南方海岸上的居民，即可能到達巴拉望島和婆羅洲。在這兩個地方，目前都曾經發現了繩紋陶。在巴拉望島的 Tabon Cave 遺址中的 Duyon 洞發掘出繩紋陶器，從該洞的一個火塘所獲得的一個 C-14 年代是 3730 BC（Fox 1970：62）。在婆羅洲

的 Gua Sireh 遺址，也發現了繩紋陶，Datan 和 Bellwood（1993）依據 C-14 年代估計約為 5000 年前。在這個遺址 C-14 測定為 4300 BP 的陶片上還發現了摻合了稻殼和碳化的稻穀。這些可能跨越南中國海而來的新石器時代的居民，無疑也可能繼續向東南亞的其他海島和太平洋擴散，但是目前的證據同樣不清楚。（圖 1）



圖 1：南島語族多元擴散路徑假說及相關考古遺址位置示意圖
(Map showing multi-route expansion model of the proto-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and locations of related archaeological sites.)

（四）更早的源頭？

如上兩節所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到越南北部之間海岸地帶的原南島語族（Proto-Austronesian）人群曾經擴散到砂朥越、婆羅洲一帶。這個看法，似乎與 Solheim 的假說相近。但所不同的是：Solheim 認為這些說原南語的人群是來自東南亞海島上的先南島語（Pre-Austronesian）島民，他們航行到大陸沿岸受到影響，並習得製陶技術，再反向回到海島東南亞。這又牽涉到一個問題：原南島語的源頭為何？他們又與那些考古文化有關？

在語言學上，關於原南島語的源頭，目前有一個假說，即 Austric Hypothesis。這個假說早在 1906 年即由 W. Schmidt 所提出，主張南島語與南亞語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Austric phylum。Robert Blust 支持這個假說並與試圖與考古文化聯繫起來。他認為南島語與南亞語的一個共同的祖先是在雲南和緬甸交界之處，種植稻米的農民。他們一方面順著 Brahmaputra 河流到達印度的東部發展成 Munda 語；沿湄公河南下發展成 Mon-khmer 語；進入紅河流域發展出越語。另一方面沿長江東行到達長江下游發展成原南島語，並向中國東南海岸擴散。（Blust, et al. 1996）

但是以考古學的資料來看，要探討原南島語族的更早的源頭，似乎需要去找尋上述中國南方海岸 6000-5000BP 之間以沙丘遺址和繩紋陶為代表文化的來源。目前在嶺南地區發現了一系列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一些學者認為它們可能就是這些晚期沙丘文化的直接源頭（吳曾德、葉楊 1994）。進一步研究與釐清它們之間的傳承和發展脈絡，將是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

六、結論

關於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的研究，大約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但是早年的研究稀稀落落，並未受到重視。上一世紀 70 年代末期以來，關注這個問題的學者逐漸增多，以後隨著東南亞和太平洋考古發現的增多，加上 DNA 分析用之於探討人群的移動，近年來變成了一個流行的課題，並產生了一些假說和爭論。然而檢視目前各個爭論所能提供的證據，其實都還有所不足。

筆者在過去也曾提出一種看法，認為：原南島語族從大陸東南沿海的原居地，向東南亞和太平洋海島擴散的主要路徑，除了跨過臺灣海峽到達臺灣之外，主要是沿閩越海岸，跨越南中國海，到達砂朥越、並繼續延伸到菲律賓，然後再逐步擴散到婆羅洲，馬來半島的南部、印尼群島，最後遍佈大洋洲的各個島嶼（Tsang 1992）。在本文中，筆者根據臺灣和其周邊地區新出現的考古資料，仍然認為原南島語族的居地應該是在福建南部到越南北部海岸之間的南中國海北岸之海岸地帶，但是以珠江口最為中心，並且可能基於長期對海洋環境的適應及航海知識的增進，或緣於目的性或意外性的複雜動機或因素，從這一漫長的海岸地帶經由多元的路徑向東南亞海島擴散。

參考文獻

王花弟

- 2005 〈織坪隴遺址的石器—兼談遺址文化的屬性〉，收入陳仲玉、潘建國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考古專題研究中心編輯，連江縣政府發行，頁 351-337。

加藤晉平

- 2003 〈閩粵臺地域史前文化交流的問題〉，《東南考古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277-283。

李壬癸

- 1979 〈從語言的證據論臺灣土著的起源〉，《大陸雜誌》，59：1，頁 3-4。

李坤修

- 2002 〈卑南遺址之新發現及新問題〉，《臺東文獻》7：41-713。
2005 臺東縣常濱鄉僅那鹿角（Kingnaluga）遺址的調查試掘報告，《田野考古》10：2，頁 49-84。
2006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及其重要發現，《臺東文獻》12，頁 17-47。

何傳坤、劉克竑編

- 2005 《鹿寮遺址標本圖鑑》。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阮文好

- 2006 〈越南的多筆文化〉，《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史前考古—紀念甌皮岩遺址發掘 3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41-346。

林小云

- 1998 〈從考古發現看閩臺史前居民的生活習俗與生態環境〉，《福建文博》1998 年第 1 期，頁 98-100。

林公務

- 2005 〈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文化綜述〉，收入陳仲玉、潘建國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考古專題研究中心編輯，連江縣政府發行，頁 75-100。

金關丈夫

- 1943 〈臺灣先史時代に於ける北方文化の影響〉，《臺灣文化論叢》1:1-16。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 1950 〈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6:1。收入譚繼山譯《臺灣考古誌》。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頁 36-40。

吳曾德、葉楊

- 1994 〈論新石器時代珠江三角洲區域文化〉，《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43-160。

屈慧麗

- 2004 〈南勢坑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004 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報告集》。中研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考古專題中心，頁 39-68。

珠江三角洲史前遺址調查組

2000 〈珠江三角洲史前遺址調查〉，《考古學研究四》。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355-403。

洪曉純

2006 〈臺灣史前玉器在東南亞的分布及其意義〉，《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史前考古—紀念甌皮岩遺址發掘 3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24-340。

凌純聲

1950 〈東南亞古文化研究發凡〉，《新生報民族學研究專刊》（1950 年 3 月 22 日）。又見《主義與國策》，44：1-3。

陳有貝

2002 〈臺灣與琉球列島的史前文化關係〉，《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8 期，頁 1-35。
2005 〈蘭陽平原淇武蘭遺址的問題與研究〉，《田野考古》，10：2，頁 31-48。
2005 〈淇武蘭遺址發掘對蘭陽平原研究的意義〉，載於《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0 月。

陳維鈞

2005 〈金門金龜山貝塚的重要性及其文化意義〉，收入陳仲玉、潘建國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考古專題研究中心編輯，連江縣政府發行，頁 101-134。

國分直一

1943 〈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黑陶文化〉，原發表於《臺灣文化論叢》（1943），收入國分直一、金關丈夫《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
1940 〈臺灣南部に於ける橄欖石玄武岩を用いた石器の分布に就いて〉，《臺灣地學記事》11(3/4): 111-118。收入國分直一、金關丈夫《臺灣考古民族誌》（1981）。東京：慶友社。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

1955 〈臺灣先史時代的文化層〉，原發表於《學海》第 1 卷 6 號（1943），後收入《東南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 2 卷第 7 篇（1952），中譯版收入《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55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商志譚、譚世龍

1990 〈環珠江口史前沙洲遺址的特點及有關問題〉，《考古》11 期，頁 48-56。
2000 〈環珠江口史前沙丘遺址的特點及有關問題〉，收入商志譚編《香港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66-67。
2006 〈陝西省考古所、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西貢沙下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6），頁 34-45。

張光直

1959 〈華南史前文化提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頁 43-73。
1989 〈新石器時代的臺灣海峽〉，《考古》（6）：541-550。

游桂香

2005 〈從熾坪隴遺址的陶器探討其文化屬性〉，收入陳仲玉、潘建國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考古專題研究中心編輯，連江縣政府發行，頁 351-337。

福建省博物館

- 1983 〈福建閩侯縣曇石山遺址發掘新收穫〉，《考古》12，頁 1076-1091。
1991 〈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7，頁 587-599。
1998 〈福建閩侯庄邊山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8 年第 2 期，頁 171-227。
1994 〈福建霞浦黃瓜山遺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4 年第 1 期，頁 3-37。

福建博物院、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

- 2003 〈福建東山縣大帽山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12 期，頁 19-31。

葉美珍

- 1999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石板棺〉，《臺東文獻》5：43-63，1999。

廖國一

- 2006 〈環北部灣地區史前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史前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87-395。

鄧聰、區家發

- 1991 〈珠江口史前考古芻議〉，《環珠江口史前文物圖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xi。

臧振華

- 2000 〈呂宋島考古與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問題〉，蕭新煌主編《東南亞的變貌》。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3-26。
2006 〈臺灣南科大埕坑文化遺址的新發現檢討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問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北京：文物出版社。

臧振華、洪曉純

- 2001 〈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和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4，頁 1-17。

臧振華、潘怡仲

- 2005 〈澎湖七美島史前石材資源的開採：一個島嶼考古學的研究〉，收入陳仲玉、潘建國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考古專題研究中心編輯，連江縣政府發行，頁 199-238。

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

- 2006 《先民履跡》。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臧振華、Rey A. Sangtiago、洪曉純

- n.d. 《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發考古調查發掘報告》。

蘇雲峰、符駿

- 1986 〈東南亞瓊僑移民史〉，《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Aoyai, Yoji, Melechor L. Aguilera, Jr., Hidefumi Ogawa and Kazuhiko Tanaka

- 1993 Excavation of hill top site, Magapit shell midden in Lal-lo shell middens,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Man and Culture in Oceania* 9, pp. 127-155.

Bellwood, Peter

- 1979 *Man's Conquest of the Pacif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The peopling of the Pacific. *Scientific American*, 243:5, pp. 174-185
 1983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4, p. 80.
 1984-1985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pp.107-17.
 1987 *The Polynesi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 45-46.
 1988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pp. 107-117.
 2004 *The Earliest Farmer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Bellwood , Peter and Eusebio Dizon

- 2005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dispersal.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pp. 1-34.

Beyer, H. Otley

- 1948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Origin of the Pacific Islands Popul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Philippine, Bulletin* No. 29 pp.34-36.

Blust, Robert

- 1988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s* 26(1): 45-67.
 1996 Beyond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the Austric Hypothe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rchae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86, No. 5, pp. 117-158.

Cabvarilla , Israel

- 1972 *Neolithic Shellmounds of Cagayan: the Lal-lo Excavation*. Manuscript, National Museum, Manila, Philippines.

Chang , Kwang-chih

-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New Have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pp. 240-242.
 1989 Taiwan archaeology in Pacific perspective, In K. C. Chang, et al. edited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aiwan Area: Accomplishments and Prospects*, Taipei: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atan, Ipoi and Peter Bellwood

- 1993 Recent research at Gua Sireh (Serian) and Lubang Angin (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 Sarawak.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44:65, pp. 93-112.

Diamond, J. M.

- 1988 Express train to Polynesia. *Nature* 336, pp. 307-8.

Dyen, Isidore

- 1965 A Lexico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Memoir* 19. Baltimore: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 Waverly Press, Inc

Ferrell , Raleigh

- 1966 The Formosan tribes: a preliminary linguistic,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nthesis.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 no. 21, pp. 97-130.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17.

Fox, Robert

- 1959 The Calatagan excavation. *Philippine Studies* no.7, pp. 325-390.
1970 The Tabon Caves. *National Museum Monograph 1*, Manila.
1971 *Ancient Man and Pleistocene Fauna in Cagayan Valley,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A Progress Report*. Manuscript, National Museum, Manila, Philippines.

Green, R. C.

- 1991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current evidence and proposed models.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1, pp. 295-305.

Heine-Geldern, Robert

- 1932 Urheimat und Früheste Wanderungen der Austronesier. *Anthropos*, 27: 3/4, pp. 543-619.

Heyerdahl, Thor

- 1951 *Kon-Tiki: Across the Pacific in a Raft*. Rand McNally & Company.

Hung, Hsiao-chun

- 2005 Neolithic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rn Luzon: the pottery and jade evidences from the Cagayan Valley.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pp. 109-134.

Hung, Hsiao-Chun, Yoshiyuki Iizuka, Peter Bellwood, Kim Dung Nguyene, Bérénice Bellina, Praon Silapanth, Eusebio Dizon, Ipoi Datan, and Jonathan H. Manton

- 2007 Ancient jade map 3,000 years of prehistoric ex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PNAS*, vol. 104, no. 50, pp. 19745-19750.

Hutterer, K. and W. MacDonald

- 1982 *House built on Scattered Poles: Prehistory and Ecology in Negro Oriental. Philippines*. Cebu City: San Carlos Publications.

Kayser, M., S. Brauer, G. Weiss, P. A. Underhill, L. Roewer, W. Schiefenovel, M. Stoneking

- 2000 Melanesian origin of Polynesian Y chromosomes. *Current Biology* 10, pp. 1237-1246.

Linton, Ralph

- 1955 *The Tree of Culture*. New York: A. A. Knopf.

Kingsley, Danny

- 1996 Data report on the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lower Cagayan River,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Culture*, No. 10, Japan.

Maglioni, Fr. R.

- 1975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Eastern Kwangtung*, Journal Monograph II,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Masanari, Nishimura

- 2006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Iron age in the Red River Plain and the surrounding*, 《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史前考古—紀念甌皮岩遺址發掘 3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47-373。

Meacham , William

- 1988 Improbability of Austronesian Origins in South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26: 1, PP. 90-106.
- 1995 Austronesian Origins and the Peopling of Taiwan. In P. J-K. Li et al. eds.,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Symposium Series No. 3.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pp. 227-254.
- 2004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 Wilhelm G. Solheim II Festschrift*, . Quezon City: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 p.62.

Melton , T., R. Peterson, A. J. Redd, N . Saha, A. S. Sofro, J . Martinson, M. Stoneking.

- 1995 Polynesian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identified by mtDNA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57, pp. 403–14.

Mijares , Armand Salvador B.

- 2006 The early Austronesian migration to Luzon: perspectives from the Penáblanca cave sites.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6, pp. 72-78.

Nguyen Viet

- 2005 The Da But culture: evidence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Vietnam during the middle Holocene.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5, pp. 89-93.

Oppenheimer, S. J. and M. Richards

- 2001 Polynesian origins. Slow boat to Melanesia? *Nature* 410, pp.166–167.

Ronquillo , Wilfredo P.

- 1981 *The Techn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es of Lithic Flake Tools from Rabel Cave,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National Museum, Manila, Philippines.

Shutler Jr. , R. and M. Mathisen

- 1979 Pleistocene studies in the Cagayan Valley of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Journal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 vol. 8, pp. 105-114.

Shuter Jr., Richard and Jeffrey C. Marck

- 1975 On the dispersal of the Austronesian horticulturalists. *Archaeology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Oceania* 10(1): 81-113.

Solheim, Wilhelm

- 1960 Jar burial in the Babuyan and Bantanes Island and in central Philippin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jar burial elsewhere in the Far East.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vol. 89, no. 1, pp. 115-148.
- 1969 New direc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prehistory. *Anthropologica*, N. S. vol. XI, no. 1, pp. 30-44.
- 1975 Reflections on the new data of Southeast Asian prehistory: Austronesian origin and consequence. *Asian Perspectives* 18, pp.146-160.
- 1988 The Nusantao Hypothesi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ustronesian Speaker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p. 81 - 84-85.
- 1996 The Nusantao and north-south dispersal.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5, pp. 101-9.

- 2001 The Pre-Sa Huynh-Kalanay Potter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stronesian Cultures: Issues Relating to Taiwan. Dec. 8-11, 2001.
- 2006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Unraveling the Nusantao*.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Szabo, Katherine and Sue O'Connor

- 2004 Migration and complexity in Holocene Island Southeast Asia. *World Archaeology* Vol. 36:4, pp. 621-628.

Terrell, E.

- 1988 History as a family tree, history as an entangled bank: constructing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prehistory in the South Pacific. *Antiquity* 62 (1988), PP. 642-657.
- 2004 The 'sleeping giant' hypothesis and new Guinea's place in the prehistory of greater Near Oceania. *World Archaeology* 36:4, PP. 601-609.

Thiel, Barbara

- 1986-7 Excavations at the Lal-lo Shellmiddens, Northeast Luzon, Philippines. *Asian Perspectives*, 27:2, pp. 70-94.
- 1986-7 Excavations at Arku Cave, Northeast Luzon, Philippines. *Asian Perspectives*, 27:2, pp. 229-264.
- 1988 Austronesian Origins and Expansion: the Philippine Archaeological Data. *Asian Perspectives*, 26: 1, pp. 120-129.
- 1988-9 Excavations at Musang Cave, Northeast Luzon, Philippines. *Asian Perspectives*, 28:2, pp. 61-81.
- 2003 *Ancient DNA may be misleading scientists*, ABC Science online, 18, February. Hidefumi Ogawa and Melchor L. Aguilera, Jr.,

Trejaut, J. A., T. Kivisild, J. H. Loo, C. Lee, C. L. He, C. J. Hsu, Z.Y. Li, M. Lin

- 2005 Traces of archaic mitochondrial lineages persist in Austronesian-speaking Formosan populations. *PLOS Biology* 3 (2005), p. e247.

Tsang, Cheng-hwa

- 1992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9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ca, pp. 148-179.

Once Again on the Austronesian Origin and Dispersal

Cheng-hwa Ts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Studies, RCHSS, Academia Sinica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s one of the largest language familie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more than 1200 languages, and the current population of its speakers is about 400 milli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s north to Taiwan, south to New Zealand, east to Easter Island off the west coast of Peru, and west to Madagascar near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covering about one-third of the vast waters of the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which possess systematic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and have many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culture, may have a common origin and the time span of their dispersal should not be too long. However, “where was their homeland?” and “why and how did they disperse from their homeland?” are always important questions need to be answered in the huma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recent years, many linguists, archaeologists, anthropologists and even molecular biologists have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se questions and have raised different theories to argue. In the arguments, the role of Taiwan and the linguistic, archaeological and genetic data from Taiwan have always been of great concern.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between the Asian mainland and the Pacific, but also the possible links between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and the living Austronesian inhabitants in Taiw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some new archaeological data found in Taiw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nd to rethink the questions on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ancestors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may have inhabited on the coastal areas between southern Fujian and northern Vietnam, and through multiple, instead of one, navigation routes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 dispersed into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Southeast Asian islands.

Key Words: Austronesian, origin and dispersal, Express-train Hypothesis, Out of Southeast Asia Hypothesis, slow boat hypothesis
